

名家读史笔记 杨天石◎主编

写在历史的边上

王季文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名家读史笔记

杨天石◎主编

写在历史的边上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写在历史的边上 / 王学泰 著; 杨天石 主编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5.12
ISBN 978-7-5060-8857-2

I. ①写… II. ①王… ②杨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史评—文集
IV. ① 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4110 号

写在历史的边上

(XIE ZAI LISHI DE BIANSHANG)

作 者: 王学泰

主 编: 杨天石

责任编辑: 戴燕白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

邮政编码: 100007

印 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9.25

字 数: 24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8857-2

定 价: 52.0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85924736

学泰那个文字啊，老到。这个确实经过炼狱炼过以后的。

——邵燕祥

王学泰的“游民文化”，与余英时的“士文化”、李琚平的“门客文化”鼎足而三。

——鄢烈山

他（王学泰）经历了人生那么大的灾难，他不夸张，就是自己亲历的事情。最难得的，我跟邵先生感觉一样，他的清醒，也就是他的觉悟。他最难得的是他的清醒和觉悟。

——王得后

“名家读史笔记”丛书序 |

读了几十年文章，自己也写了几十年文章，说老实话，大部分文章都淡忘了。即使是自己写的，虽曾呕心沥血，一笔笔写，一键键敲，但是，也大都淡忘了。题目，自然记得；内容，却只记得大概。但是儿时读过的一些文章，例如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、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、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、苏轼的《前赤壁赋》、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却至今不忘，有的还能自头至尾地背诵。为何？我想，其原因首在于小。人的记忆力都有限，谁记得下，背得住那动辄万字的大文、长文！纵观中国文化史，能够流传千古、传诵不衰，刻入民族记忆的名文似乎都是小文，篇幅虽短，却小中见大，精光独具。

感谢东方出版社愿意再版我多年前的旧作《横生斜长集》，而且希望我主编一套小文丛书，我觉得此意大佳，幸得邵燕祥、王学泰、陈丹晨、雷颐诸大家支持，于是就有了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几本书。

我虽然提倡小文，钟情小文，但是，并不排斥大文、长文、大著、巨著。宇宙万物，各有其长，也各有其用。古人云，“并育而不相害”，“并行而不相悖”，此之谓乎？

杨天石

2016年7月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

I 自序

钱锺书先生散文名著《写在人生边上》，享大名七十余年，拙作的命名难免效颦之讥。不过钱先生的“人生边上”只是一个比喻或象征，他把人生看作“一本大书”，人们的写作不免是为这本“大书”做“书评”，而钱先生把自己的写作列在另一类：

世界上还有一种人。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。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，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。每到有什么意见，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，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，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，外国书里的 *Marginalia*。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。因为是随时批识，先后也许彼此矛盾，说话过火。他们也懒得去理会，反正是消遣，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、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。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？

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，那么，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。这本书真大！一时不易看完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。

从序中可见钱先生写作时的随意和潇洒；而拙作“历史的边上”却是实指，所谓“历史”就是指史学，所谓“边上”就是边边沿沿的一些小事件、小问题。

我是学文学的，近几十年来工作在文学研究所，以往的写作都与文学有关。可是，我私心所好却在于史。因此，读史书往往比文学多，特别是退休以后，不承担集体项目了，当读书成为休闲的时候，我更着意于历史。当然我读史不同于以研究为目的的史学家，我也注重趣味，或者如当今青年人常说的“好玩”，然而遇到问题，总喜欢刨根问底，有时也很纠结。偶有所得，敝帚自珍，于是便有了这些零零碎碎的文字，虽然所涉及的也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“文革”之前历史研究承担着重大使命，见诸报刊的文字都属于宏大叙事，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所谓的“五朵金花”（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、历史上的农民战争、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问题），后来史学圈子里戏称之为“显学”。这种研究风气的短处就在于把十分具体、生动的历史处理成干僵硬的规律与条款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这种研究与丰富、多样、生动的传统史学相比较，很不相称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解放思想，打破禁区，史学研究做得最好，这是学术界公认的；九十年代以来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活跃于荧屏，极大地带动了史学的通俗化，许多以历代史为题材的通俗作品成为出版界的抢手书，这在普及国史知识的正面作用之外，也不免有许多误导，其原因在于以往的基础研究不到位。不仅电视剧中出现许多违背历史常识的现象，就是通俗史书的硬伤也不少。我想史学界的饱学之士也许不太关心这些，而我这个旁观者自幼便有了插嘴的习惯。当然这些拾遗补阙的文字，谬误、琐屑也在意中，好在古人有云“贤者识其大者，不贤者识其小者”，聊以自嘲和自解吧。

本书所收录有读书随笔，也有报刊约稿，无一定体例，但要编成一个集子，还是按照文章内容稍加分别为好。全书共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：润物无声说风俗，谈传统风俗习惯；第二部分：萧规曹随论制度，议论历史上的制度与规则；第三部分：书海世情偶一瞥，记最近

几年来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与历史有关的时事以及我的一些议论。当然，这种分类只是为阅读提供些方便，希望读者不必胶柱鼓瑟。

王学泰

目 录

润物无声说风俗

- 002 | 话说元旦
- 004 | 立春琐谈
- 009 | 清明节的变异
- 013 | 杏花·春雨·江南
- 020 | 端午节祭与祭祀泛滥
- 023 | 礼乐文化中的玉
- 026 | 村社组织的黏结剂：传统礼俗
——读《礼失求诸野》

萧规曹随论制度

- 038 | 软约束与硬规范
- 040 | 冷血皇帝——乾隆

- 043 | 说“罪己诏”
- 061 | 说“皇恩大赦”
- 075 | 科举制度的本质
- 080 | 太宗皇帝真长策，赚得英雄尽白头
——作为皇权统治弹性机制的科举
- 085 | 远去一百年的贡院
- 089 | 模糊千年的一条民事法
- 101 | 吏胥之害
- 110 | “吏治”与“治吏”
——评刘建基《中国古代史治札记》
- 116 | 王安石变法与钱

书海世情偶一瞥

- 124 | 汉字
- 128 | 粥的故事
- 134 | 淡：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
- 141 | 中英的改革与保守
- 145 | 说跪拜
- 151 | 说诚信
- 161 | 老北京的幽默
- 177 | 市场上应该有些闻香果

- 180 | 呼唤狂者与狷者
- 183 | 君子之德，常存敬畏
- 185 | 文化·“武化”·商业化
- 189 | 有感于“电影经典对白的评选”
- 192 | 从“不怕鬼”到“不怕兔”
- 197 | 有组织的犯罪·帮会·黑社会
- 200 | 又见“武林”
- 203 | 从“有鬼无害论”说到“有鬼有害”
- 207 | 做子民、臣民，还是做公民？
- 210 | 黄宗羲定律与“黑宗羲定律”
- 213 | 自然生态下的知识人
- 222 | 日记漫谈
- 234 | “长毛状元”与《国朝诗别裁集》
- 244 | 《闲话藏书》的闲话
- 248 | 《丑陋的中国人》及其风波
- 254 | 写在历史的边上
——读《中国好人》
- 260 | 审视清代会党泛滥的新角度
——评《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》
- 266 | “国学”不可能成为主流学派
- 273 | 传统的读书就是“慢读书”
- 284 | 再说传统读书



物无声说风俗

话说元旦

元旦本来指元月元日，也就是口头上说的“大年初一”。现在农历上的大年初一，降格为春节初一，元旦专属阳历年的第一天。现在日历上虽然是阳历（或称公历、公元、新历、西历）、农历（或称阴历、夏历、旧历、废历）并列，但阳历占主流位置，官方以及社会使用的都是阳历，农历使用范围越来越窄，近些年来仿佛只有在“春节”“端午”“七夕”“中秋”“重阳”等传统节日里人们才会想起农历。这些已成为习惯，用元旦称呼阳历新年也已成为语言定式，读者可能不知道它是经历了百余年的磨合才完成的。

中国自古特别重视历法，自周代以来，每年秋冬之际朝廷把第二年的历书颁赐给诸侯或地方守令，确定每个月“朔日”（初一）。接受一个新朝，首先就要接受它的历法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奉正朔”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，人们有了大同意识，不再自标独特，采用世界通用的阳历，直至今日。

然而，使用阳历不自1949年始。近读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集，书前附其年谱，其中记载辛亥年十一月（旧历）“十三日，孙文至南京就职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，改用阳历，定是日为民国元年元月元日”。许多学者也认为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宣布使用阳历是用阳历始。

如果再细致一些，在此之前处于风雨飘摇的满清朝廷已于1911年12月7日（阳历）上谕有“资政院奏、议决改用阳历”，并指示内阁宣布和“筹办”事宜。与中华民国政府相比早了23天。

为什么要使用阳历？一是进步，二是方便。清末民初，那时先进的知识人一改传统上“向后看”的观念，崇尚进步。在历法上也是如此，梁启超就说“歌白尼破坏旧历学而新历学乃兴”。更重要的是方便，那时中国的大门被列强闯开，与世界交往增多，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使用阳历，据说不用的仅有俄国、日本、土耳其。中国外出使节感到特别不便的就是历法与服饰，所以早在光绪年间就有人向朝廷提出要剪辫易服和使用阳历。这两者看来既不关当朝的权力，也不损害其物质利益，但却是名分所系，一直没有通过。待武昌革命爆发，朝廷岌岌可危，甚至摄政王载沣也撂挑子了，于是在同一天也宣布“凡我臣民，均准其自由翦发”并改用阳历。

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担任临时大总统，袁上台强势推行阳历，老百姓尚未习惯，特别在过年问题上矛盾尤为突出。如民初学人李定夷所言：“吾国改用阳历，为期尚浅。故北京市面，表面上虽已于新历新年时，遍糊春帖，悬挂国旗，以志庆贺，而一切实际上过年之事，则阴历年底方纷纷准备。”（《民国趣史》）恽毓鼎在《澄斋日记》中也记载了民国四年（1915）元旦时“地方官厅，百端点缀，勒令民间过年，然应者不过国旗招展而已（间有被迫换桃符者）”。要全国老百姓都在阳历“元旦”过年，在当时是不可能的，只能采取行政手段强迫，但老百姓还是筹备过阴历年。无怪有人发牢骚说“反正以还，一律改行太阳历。康次由为吾诵长沙一土地庙春联云：‘男女平权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；阴阳合历，你过你的年，我过我的年。’盖凡土地皆合塑男女像，男像曰土地公公，女像曰土地婆婆，故出幅云尔。然而读终上下幅，固未有不捧腹葫芦者。”（吴恭亨《对联话》）涉及风俗习惯变迁的事情，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。阳历使用更是如此。

立春琐谈

我们的民族自古以农立国，注重季节的变换，对于春季尤其敏感。早在商代，我们从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就可以看到“寅今春其至”（𠄎𠄎𠄎𠄎𠄎）“在春田受年”这样对春天充满欢悦和企盼的短句，让我们感受到三千年前的古人情感的激荡。代表民族情感的诗歌也有无数歌咏春天的诗句。《诗经》开卷的《关雎》《桃夭》等篇章都把男欢女爱的场景设置在万物复苏的春天，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都在展现着春季给大自然带来的无限生机。

其实抛开诗人的浪漫，春天不过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运转到某个方位罢了。地球和太阳不停地运动，春天会离去，下一个春天也还会再来，与我们过星期一、星期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当然这是我们有了一些科学知识后的认识，而在上古时期，人类草昧初开，时间在他们意识中还是模糊一片的，就像庄子给我们讲的那位“中央之帝”“浑沌”，没有七窍，就是肉球一个。农业劳动、特别是播种与收获使人们对时间有了分段和循环的观念。商代人们开始把季节分成了春、秋二季。我们看到出土数以万计的甲骨中有“春”“秋”，而没有“冬”“夏”，因为这两季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，春种秋收，在农人头脑里会留下最深的印象。

春字在甲骨文写作𠄎，《殷墟甲骨文引论》解释这个字时说：“从林、从草、从日、从屯，屯标声。象意字，象日照春阳，草木丛生。本义是春天。《说文》：‘春，推也。从草从日，草春时生也。屯声。’”这段话的意思：春是个象意字（也就是许慎所说的“会意字”），象征

着太阳从丛林、丛草中艰难地升起。“屯”象征小草艰难地破土而出。金文、小篆春字略有变化，但都没有离开春回大地、万物萌生这一图景。春的发声来源于“屯”，春天虽然到来了，人们开始播种了，但从耕种到收获还要经历多少艰难，这正像小草出土一样。对于“春”古人赋予了丰富的内涵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“日”，太阳对于农耕是至关重要的。

商代已经有了对太阳的崇拜，《尚书·尧典》中就有帝尧派人“寅宾出日”（春分那天到东海之滨迎接太阳升起），因为古代帝王除了是政治上的统治者外，还是精神上的领袖，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事务自然应由君王主持。到了汉代“天一合一”确立，于是，天子精神领袖地位突出了，“日”在《易经》中是象征君位的，迎接太阳的大典怎么能委托臣僚呢？儒家经典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迎接太阳应该是天子。“先立春三日，大史谒之天子曰：‘某日立春，盛德在木。’天子乃齐（斋戒）。立春之日，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以迎春于东郊。还反，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。”在这些日子里，天子还要“居青阳左个（大寝的东堂北偏室），乘鸾辂（青色带銮铃的车子），驾仓龙（青马），载青旂，衣青衣，服（佩带）仓玉，食麦与羊”，表示与天地配合。从这些仪式我们可以感受到，皇帝面对太阳时的严肃和谦卑。

春天带来了生机，人们也要相应地遵守一些规范和做一些事情，以“顺天之气”。从上到下要遵守：勿伐木、勿覆巢、勿杀幼虫、勿杀飞鸟、勿杀母麋鹿等，以及掩埋动物的遗骸，不能处决犯人，不能发动战争等。另外还要赦免轻罪的犯人，慰问孤寡，帮助贫弱，赏赐臣僚等。总之，在万物欣欣向荣的季节里是不能逆天之道的，要对一切有生表示关爱。到底这些有多少能够切实做到，因为缺少记载，不能妄加评论。但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人类（包括统治者）在大自然面前的谦卑，这种思想意识有利于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。

“天子”是精神领袖，皇帝就是世俗的统治者了。作为农业国的头领，皇帝还要表示自己也是农人中的一分子，所以，在立春の時

候，他还要行“藉礼”。

“藉礼”最早见于《国语》，就是在耕种“藉田”。“藉田”是天子、诸侯的私人田地，其出产是用来供奉宗庙的。天子千亩，诸侯五百亩。君王先去开犁，以表示对农业和宗族的重视，以后由农民替他耕种，这反映了氏族公社时期领袖与民众是有共同的祖先。据说周朝就有了这种礼仪，经过儒家的润饰越来越隆重，成为一种国家关注农业的仪式。汉代行藉礼的仪式是：皇帝亲载耒耜（古代翻地工具，可视为原始的犁），率领三公九卿到藉田，天子推三次，三公推五次，九卿九次。然而天子执爵，与三公九卿共饮“劳酒”。历代基本照此进行。

直到清朝末这个仪式一直在实行。不过北京较冷，立春时天寒地冻，行藉礼要迟至三月了。清光绪间二十四年那一年的耕藉田的仪式是在三月十六举行的。光绪间的起居注官（在皇帝身边记载皇帝言行的史官）恽毓鼎在其日记中记载：

皇上祭先农坛，臣毓鼎侍班。寅初朝服至门外账房，与同事齐班。灯前引导，诣坛下少憩。钟动，驾临。起居注官立于阶下东向北上。礼成，上诣具服殿更衣，行耕藉礼。毓鼎亦脱朝服，随至观耕台前。上御黄龙袍，横斜挂数珠。有着蓑笠二人，授鞭进耒。礼官前导，从臣数人牵牛扶犁，挈籽种水器以从，上执鞭随其后。田夫摇彩旗，唱田歌，往返四推毕，升观耕台。顺天府率耆老、农夫，在台前行礼。王公九卿，以次扶犁，皆九推。

这大约是历史上最后一次行藉田礼，此时也可能是光绪一生心情最畅快时期，因为慈禧已经还政给光绪，光绪正在酝酿一次变法革新。本年即戊戌年，“百日维新”就在本年八月失败。从此以后，光绪被囚瀛台，不可能再出紫禁城行礼了。宣统继位，年龄太小，无行